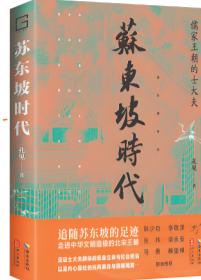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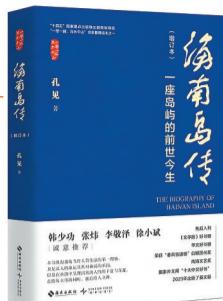


《我们的不幸谁来承担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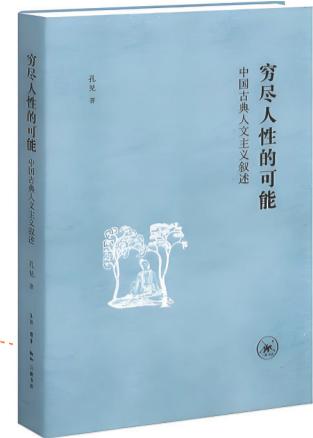
《苏东坡时代》。



《海南岛传》增订本。



《赤贫的精神》。

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叙述
穷尽人性的可能
《穷尽人性的可能》——
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叙述

作家孔见。

9月26日下午,作家孔见新著《穷尽人性的可能——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叙述》(以下简称《穷尽人性的可能》)在海南省归心书院举办首发座谈会。参与者众,名家云集,反响热烈。该书于2025年9月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,对自西周至宋明时期的中国古典人文主义,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问与阐述,并与西方人文主义做历时性的比较,质疑百年来的诸多成见与定论。该书的后序,孔见取了这样一个标题——追寻歧路上的迷羊,这或许是他这些年所有哲思的具象化表达。

从2020年11月至今,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,孔见接连出版了《海南岛传》《苏东坡时代》《穷尽人性的可能》三本著作,前两部作品甫一出版,即引发广泛关注。有评论家称,《海南岛传》初步显示了孔见的文史功力,《苏东坡时代》是孔见在文史方面抱负与才华的一次大爆发。而《穷尽人性的可能》是一本哲学论著,得到的关注也许不会超越前两部作品,但在现代新儒家学者(如唐君毅、徐复观、钱穆等)对中华传统,特别是儒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的表述意犹未尽之时,孔见能够勇敢地介入这个领域,难能可贵。

26日下午,海南日报记者就此对孔见进行了专访。

作家孔见与他的哲学: 追寻歧路上的迷羊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道

找回自己本来的模样

记者:这几年,您出版的《海南岛传》《苏东坡时代》都有很高的热度,话题性也很强,而最近出版的《穷尽人性的可能》是一部哲学著作,感觉来了个急转弯,从一片热闹进入一片空寂中。这个转变缘何而起?

孔见:在某次旅行途中,我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诗来:枯枝败叶依旧是,万里长空一雁归。生活似乎还是原来的生活,世界也还是原来的世界,只是生活在世界里的那个人被“偷换”了。他不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受害者,他一无是处却又处处皆是。回想既往求学的历程,如同在歧路上追羊,并非没有实际的裨益,但也有了“抛却自家无尽藏,沿门持钵效贫儿”的感慨。三十多年来的进学与历练,让我对自己的文化出身,有了足够深入的认识与自信;对古典文化中启示的意境,也有了切身的亲证,并在回望的时刻深感侥幸——这构成了本书撰述的前提。这本书可以视为作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考证与认同,如同被绑赴刑场前的验明正身。

四十年前,我从师范专科学校出来,成为一名中学教员。面对白云苍狗下面的世界,躁动人群中扬起的风尘,内心充满迷惘的激情。诗歌的吟哦让我变得多愁善感,白天在小路上捡起一片零落的树叶,都会浮想联翩。文学激起我愤怒或伤悲的情绪,却给这些情绪提供一条畅通的出路,它们在深夜里向我喧嚣。青春的生命如同捧在手心的玻璃瓶子,找不到安放的地方,并在想象中一而再发出炸裂的声响。某个无眠的夜晚,面对镜子里野兽般已然变得陌生的表情,我暗下决心,必须让喧嚣的大海平静下来,找回自己本来的模样。

把哲学家的文字当药物服用

记者:您的哲学因子是如何凝结而成的?

孔见:因为书写过一些想象与抒情的文字,本人被归入文学从业者的行列。但私底下的自许,始终是个迷途问道的人。生于困惑的我,不愿在迷津中沉溺。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人,像一尾鱼游弋在澄明透彻的真相里,是我少年以来怀揣的愿望。在天底下做好并做足一个人,比做什么都重要,也更加困难。带着与生俱来的焦渴,我要在沙漠里找到纯净的水源。为此,我可以耗上一生的资粮,乃至生生世世。

20世纪80年代,西方思想的潮水,一波又一波地涌人国内,我几乎是饥不择食地汲取各种精神的给养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从克尔凯郭尔、尼采、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海德格尔、萨特一脉的存在哲学,尤令我着迷。我几乎是把他们的文字当作药物来服用,以期治愈自己内心的焦灼。但实际的情况似乎恰如其反,他们加重了

我的困顿与迷惘,使得身为碳基生命的我,被一堆无用的激情所燃烧,甚至成为一个精神的难民。克尔凯郭尔在哥本哈根街头的徘徊,消耗着自己一生的慧命,还耽误了一个女人的青春,并且终生都得不到原谅,让人倍感凄凉。尼采像是从高山绝顶上下来,以狮子的怒吼唤醒人们对自身命运的承担,但他自己却已经承担不起,身体还健硕如故,精神就到了崩溃的边缘。这不仅让生下他的母亲忧虑重重,也让追随他的人不知情何以堪!陀思妥耶夫斯基恍惚迷离的语言,散发着热锅蚂蚁般的焦灼与不祥。至于可怜的卡夫卡,一生都陷入命运的迷阵,心灵也被囚禁在自己造设的坚固城堡里。生活中发生的一切,对他而言不是成全与造就,而是一种碾压与摧毁。在萨特、加缪的话语中,世界似乎只是偶然事件的堆积,生存的意义只能通过反抗来求证。而零乘以任何数字都等于零,所有针对荒谬的反抗行动,都不过是让荒谬变得更加荒谬而已。不过,在海德格尔黑森林里的小路上,我还是徘徊了很长时间。在我的想象中,他的精神原型,更像是个从深谷里走出来的东方哲人,但小路并非大道,流连在林中空地的他,远未抵达云端之上的绝顶。

清水流过就有草木生长

记者:《穷尽人性的可能》中关于中国古典人文主义的探问与阐述,自西周至宋明时期,时间跨度这么大,您是如何把它与西方哲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?

孔见:对现代西方思想大师们的跟随,给我带来的启示并不比困惑更多。某一天醒来,我忽然发现,那些被当作现代人文导师的人,包括尼采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波德莱尔、卡夫卡等,其实都是些病人膏肓的天才、荒野上迷路的羔羊、深夜街头的流浪者。人们之所以找上他们,并非

因为他们掌握了天地的奥秘和生命的圭臬,而是因为同病相怜、天涯沦落人的抱头痛哭。跟随他们的脚步,只会走进更浓的夜色。正是在这种情形下,一肚子浑水的我,将目光转向了日出的东方,投入古典思想的问学与修习。在一篇短文里,我写下这样的句子:“我不想做庞贝城里的石尸,来记录一场灾难的恐怖。”对于这个世界,我们已经不是孩子,而是孩子他爹乃至他爷爷,早就没有了撒娇与哭诉的权利,唯有义无反顾地受理与担当,甚至是最终的判决,并心甘情愿地接受随之而来的结果。

由道而儒、由儒而释的进入,让我对所置身的世界和拥有的生命,有了某种深入而又辽远的体认,一条四通八达的道路隐约在云水间浮现。这种将人间烟火的世俗生活与浩渺天道贯通起来、与万物打成一片的文化,可谓气象大焉,蕴含着哺育人格的强大力量,给人带来了深邃而美妙的存在感。与那些已经作古千年的先贤交心,让我的精神获得了如同醍醐灌顶的加持,我找到了古老文化的初乳,精神的生命也得以润泽和滋养,并且变得强壮起来,人生有了一个堪称华丽而又豪迈的转身。我学会了对生命本质意义上的尊重,而不是人情世故里的客客气气。我坚信自己在沙漠里找到了永不枯竭的水源,并且有了荣归故里的感觉。云在青天水在瓶,那个曾经备感危脆的玻璃瓶子,也终于有了恒久安放的所在,免于碎落一地。

八年前,我写出近似于本书导言的文字。韩少功先生过目后,给予热情的回应,并鼓励我尽快展开成书。能够欣赏别人的好,并且慷慨于成人之美,是先生行仪中令我感动的部分,而这种感动也是本书得以完成的驱力,尽管他并不苟同,甚至反对我的一些意见。此前,我曾经说过“有清水流过的地方,就会有草木生长”。现在,这句话我还想再说一遍。同



孔见在新书首发座谈会现场给读者签名。杨道 摄